

袁振声 著

巴金小說藝術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巴金，作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①，“一代的文学巨匠”^②，从踏上文坛之日起，至今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随着岁月的增加，巴金这个光辉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所理解、所热爱、所崇敬。然而人们在估量和判断他的文学业绩和艺术价值上，又是走过了多么曲折的道路！

且不说十年动乱期间，巴金所受的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残，艺术上的讨伐；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巴金创作的横遭贬斥，在现代作家中也是十分突出的。1958年至1959年间，在席卷全国的“插红旗，拔白旗”的群众运动中，巴金的作品首当其冲地被列为“拔”的重点对象。这次对巴金作品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对巴金创作的空前的大扫荡。此后，在学术界谈“巴”色变，巴金研究成为学者们望而生畏的禁区。

我们高兴地看到，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巴金研究中有了可喜的进展，可贵的突破。许多专家、学者对巴金的世界观及其创作的思想倾向，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这种探讨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应当继续深入地展开。然而我们

① 《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第35页。

② 《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也不无遗憾地感觉到，研究者们对巴金的表现艺术，对巴金的艺术观点、艺术风格，却是大大地忽略了。目前出版和发表的研究巴金的著作和论文，大多是集中探究作为“思想家”的巴金；而作为“艺术家”的巴金，却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甚至也还没有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有感于此，笔者不揣冒昧，草成此书，其意图就是提醒艺术界不要忘记和忽略“艺术家”的巴金！

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本书的写作，就是力图阐述巴金是怎样的“艺术家”，——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上，阐述他的独特的艺术观点、艺术风格及其独到的艺术成就。因精力所限，本书探讨的范围仅限于巴金小说创作方面的表现艺术。

巴金多次谈到：“我不是艺术家”。也许正是这句话招来一些人的误解，从而忽视了对作为“艺术家”的巴金的研究。在我们看来，这句话既不是他的自谦之辞，也不是它的字面所显示的意义，而是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巴金独特的艺术观点和艺术风格的基本要素，也就尽在其中了。单是这句话，就值得写出洋洋万言的论文加以探讨。本书写作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对此作出必要的阐释。

由于学术界过去对巴金小说的表现艺术缺少研究，因而这里对其表现艺术方面的问题大都作了涉猎。其中“文艺观点”一章可视为本书的一个纲，其基本观点在以下各章中又结合作品实际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各章既有各自的探求重点，同时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重视内心的剖示，强调感情的抒发，是巴金小说表现艺术中的突出特色。本书除了以两章的篇幅集中论述外，在其它一些章节中也多有涉及，

其意即在显示全书的统一性和作家的独特性。巴金小说的艺术风格呈现为多样性的统一。从纵的角度看，前后期既有明显的变化，但又有着贯穿始终的基本特色；从横的方面看，他的艺术表现的很多方面，也往往显示着对立的统一。这就为研究巴金小说的表现艺术带来很大困难。笔者虽然注意到这一特点，但限于水平，难以作出精细的阐述。这是深感愧疚的。

书中“抒情艺术”和“文艺观点”两部分，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天津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这次在编辑成册时，又作了适当的增删，这是需要说明的。

目 录

前言	(1)
一 文艺熏陶	(1)
二 文艺观点	(15)
三 人物塑造 (一)	(36)
四 人物塑造 (二)	(67)
五 心理描写	(87)
六 抒情艺术	(112)
七 语言艺术	(131)
八 结构艺术	(150)
九 环境描写	(174)
十 细节描写	(193)
十一 对比艺术	(209)
十二 创作方法	(222)
后记	(240)

一 文艺熏陶

任何作家，包括天才卓异的作家，都不是无师自通的。在巴金心目中，他的“师”就是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作家。巴金多次谈道：“我为什么写出类似小说的东西，这就是因为我从前读过不少的小说（特别是翻译的），多少受了一点影响。所以在寂寞痛苦，心受熬煎的时候，拿起笔想写点东西，就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小说的形式。”^①巴金这段自白告诉我们：正是通过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才诱发了他的艺术兴趣，培育了他的艺术才能。在研究巴金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之前，了解一下他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文学艺术的熏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总结他所受的文艺熏陶的状况，不仅可以明瞭他进入艺术宫殿的奥秘，而且有助于理解他的艺术个性。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我们评述他所受的文艺熏陶，就不单是简单地开列一个他所涉及的作家的名单和书单，而且还要通过他所受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他的所爱和所恶、所取和所舍，探究他在艺术上追求什么、扬弃什么，赞赏什么、反对什么。

（一）

巴金对自己涉猎文学作品的过程及所受的影响，曾作过

① 巴金：《关于两个“三部曲”》，《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合刊，1941年3月20日出版。

这样的说明和概括，

从十一岁到十三岁，我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如《水浒》)，从十四岁到十八岁，我已经读了很多的从欧美翻译的小说，但是，我读这些书只不过为消遣而已。从十九岁时，我已开始读英文写的外国小说了。

在起初，我很喜欢狄更斯的作品，在那时他的作品已有不少翻译成中国语了，我读了他的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和Oliver Twist(《奥列佛》即《雾都孤儿》)等中国的文言译文，以后当我在学校读英文时，David Copperfield, Oliver Twist和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都成了我的课本。

记得是在十八岁和十九岁时，我开始读俄国小说。我对这些小说很感兴趣，因为俄国人生活的环境很接近那时中国人生活的环境，他们的嗜好和性格也与我们中国人相似。

我读左拉较晚。在一九二六年去法国前，我读了他所写的巴黎的一半。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因为在马赛等船的缘故，我利用这个时间差不多把Rougon-macquart(《卢贡——马加家族》)二十部都读完了。

爱玛·高德曼的论文和她的《近代戏剧论》一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杨克曼的《狱中记》很感动我，在法国Saine, cloud(沙多——吉里)，我见到了这位作家，我希望把他的这部重要作品全部译成中文。对莫泊桑的作品，我并不怎么喜欢，特

别是对他的Bel Ami。对高尔基，我没有读过几本他的大部头著作，我更喜欢他的初期的作品，我翻译过他的《草原故事》。

在我幼年的时候，法国小说家雨果的作品也很流行，比方他的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Les Travailleurs de La Terre, Notre-Dame(《巴黎圣母院》)，以后我都找到了翻译本。

我读罗曼·罗兰的作品，只是在去法国以后。我也受了他的影响。

在这些作品以外，我还读了革命家的传记。这些书特别给我一个更深刻的印象。^①

巴金这里列举的当然反映不了他涉猎的全貌，但由此可以窥测出他阅读的基本状况。从巴金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接触和欣赏，经历了一个由中国小说而外国小说，由无目的的“消遣”而为有意识的探求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既体现了当时许多中国作家的共同规律，同时又蕴含着巴金自身的个性特点。

巴金从幼年起就受到了本民族文学艺术的熏陶。从他的许多自传性文章中可以得知，他的长辈们虽然冷酷、专横，但也并非全都不学无术。曾祖留下一卷《醉墨山房仅存稿》诗集，祖父也自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钞》，三叔也能诗能文，并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长辈们对文艺的兴趣，陶冶着巴金幼小的心灵。而使他印象最深、最感兴趣的还是母亲教他读“词”。在广元时，巴金白天在书房里跟私

^① 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第50—52页，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5月出版。

塾先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晚上则跟母亲学着读“词”。母亲用娟秀的字体从清人舒梦兰（字白香）编选的《白香词谱》上抄写下一首一首的词，教巴金兄弟读。母亲那温柔的朗读声，成为巴金“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这些，诱发了巴金对文学的爱好心理。

巴金所受民族文化的熏陶，他对民族文化的吸取，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民间文艺的爱好。由于家庭环境的熏染，巴金从孩提时起就对民间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照料巴金兄弟的杨嫂，晚上常常给他们讲述一些美妙、生动的民间神话、传说，“什么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这些故事，巴金听来感到“比什么都好听”。祖父、父亲、叔叔都喜欢看戏。巴金不仅可以常常看到戏班来家中的演出，而且经常到戏园看戏。家中几个青年人曾组织过一个新剧团，表演自己编写的剧本。主要演员是六叔和几个堂、表兄，年幼的巴金担任配角。他们“有声有色”的表演，甚至使巴金的父亲“也哈哈地笑起来”。

巴金对川戏格外感兴趣。不仅幼年时代如此，就是进入成年以后，对川戏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全国解放后，川戏团旅行演出路过上海时，总有不少演员到巴金家里作客，并且象熟人似的和他随便交谈。巴金在《谈我的短篇小说》中曾说：“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戏。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他还以川戏《周仁要路》为例进行分析：“一个人的短短的自述把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写内心的斗争和思想的反复变化相当深刻，突出了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物的性格，有感情，能打动人

心。它也有点象西方优秀的短篇作品，其实完全是中国人的东西，而且是从人民中间来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艺对巴金的影响。以“自述”的方式交代故事，通过“自述”展现人物“内心的斗争和思想的反复变化”，这一特色在巴金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其实，这种手法也就是西方小说中惯用的“内心独白”，所以巴金说它“有点象西方优秀的短篇作品”。在我国古典小说中，运用“内心独白”方式的并不多；而巴金从地方戏的人物“自述”这一独特形式中悟出了它类似西方小说“内心独白”的表现形态，并大加赞美和广泛运用。由此可见，巴金对“中国人的东西”，对“从人民中间来的东西”，既有深厚的感情，又有敏锐的捕捉力。过去，一谈到巴金的短篇小说，一些人往往称道他对西方小说的借鉴，这诚然是不错的；然而须知：它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同样融进了“中国人的东西”，或者说兼有中、西小说的艺术特征，而并非是“全盘西化”。

许多作家的创作道路都已证实：作家在童年时代所受的熏陶往往是刻骨铭心的，甚至是制约终生的。巴金幼年从民间文艺中所吸取的营养，在他后来的创作实践中是发生了作用的。巴金不少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采用了讲故事的方式，这自然是有多多种缘由的，而民间艺术的影响应该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巴金认为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容易懂”、“容易记住”，使人感到“亲切”、“痛快”。①巴金对这种审美意趣的重视和追求，不能说与民间艺术的熏陶无关吧？

① 《谈我的短篇小说》，《巴金文集》第14卷，第458页。

二、对古典文学的攻读。幼年时代的巴金熟读了许多中国古诗、文。其中象《古文观止》中的二百多篇散文，他当时虽然并不全懂，但大都能背诵；而象《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文章，他不但能读懂而且喜欢。他后来回忆说：“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①

对于旧小说，他更是读得入迷。在十岁以后，由于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大哥忙于料理家务，三哥进了中学，巴金深感孤寂苦闷，所以把全部时间用在读书上，渴望从书本中寻求安慰。他无意间得到一卷《说岳传》的残本，便如饥似渴地读下去。后来又想方设法借到《说岳传》全本来，甚至看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真正体会到所谓“读书乐”。此后又陆续读了《施公案》、《彭公案》、《水浒》等旧小说。对于《红楼梦》，巴金幼时虽不曾阅读，但长辈们都看过。父亲曾买过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石印小本，大哥后来也买了一部铅印本。巴金常常听到长辈们谈论《红楼梦》，因而从小就熟悉了书中的人物和情节。

从青年时代起，巴金阅读的重点逐渐转向外国小说；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忘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十年代初，巴金还特意托人代买了一部《批点唐诗正声》和一整套《绣像小说》。在与朋友相会时，他能够随口背诵好多首古诗，包括象《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诗。^②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强烈爱好和深厚修养。

① 《谈我的散文》，《巴金文集》第14卷，第471页。

② 黄裳：《记巴金》，《巴金专集》第1集，第34页。

巴金很少谈及自己所受我国古典文学的熏陶，甚至连他喜爱的著名小说《红楼梦》，他也否认受其影响。但这决不表明他的创作同中国传统文学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当外国朋友问及他的小说为什么重视对“女性”的塑造时，巴金脱口回答：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传统小说”的影响，“在这些巨著里，你可以看到女英雄们的非凡业绩”。^①其实，在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中，又何尝不留有《红楼梦》的影子呢！《春》中就描写了觉新兄妹听瞎子说唱《宝玉哭灵》的场面。如果我们细心体味就会感到，作品中那描写女性的细腻笔触，那表现生活场景的抒情笔调，甚至一些细节的处理和描写，都显现着《红楼梦》的韵味和笔法。尽管巴金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作家广泛地吸取文学营养，并使之融汇贯通在自己创作中的时候，对自己的借鉴和摄取是很难作出明确的判断和具体的阐释的），然而作为旁观者的读者是不难发现它对巴金创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三、对新文学的迷恋。对“五四”后的新文学，巴金倍感亲切，并且怀着景仰之情阅读着那些“散播火种”的文学作品。在众多的现代作家中，他特别推崇鲁迅、茅盾、老舍等人的创作。对曹禺、冰心、朱自清、叶圣陶、夏丏尊等作家的作品，也深表赞赏。关于自己所受新文学的熏陶和影响，巴金曾充满深情地说过这样一段话：“新文学一出现就抓住了我，我入了迷，首先做了一个忠实的读者，然后拿笔写作又成为作家。我的第一本小说在国外写成，我说过《忤

^① 黎海宁译：《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香港《大公报》1979年7月1日、2日。

悔录》的作者卢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其实我动身去法国的时候，脑子里就装满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大量作品。我没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它们使我懂得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文学。”^①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新文学对巴金的巨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作为“忠实的读者”，巴金对新文学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尽力地吸取其新鲜养料。新文学给予巴金的影响，首先是以它崭新的思想境界，“象一盏长明灯”一样“照亮”了他的心，使他“不断地看到理想的光辉”。其次，是它的明确而纯正的创作思想。他说：“为人生的艺术，为社会改革的文学，我国新文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壮大的。”^②这种“为人生”、“为社会改革”的创作宗旨，无疑对巴金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影响。

外国文学给予巴金的影响是深远的，许多研究者都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然而却往往忽略他深受本民族文化熏陶这一重要事实。巴金的创作，愈到后期愈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很难设想，一个对本民族文化缺乏兴趣和研究的作家，能够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着重指出巴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对“五四”新文学的热烈崇尚，并不是想否定和抹煞他曾经受到外来因素的深刻影响，而是在于说明：正是由于他头脑中已“装满”了中国的文学作品，成为本民族文化的“忠实”的读者，因而使他在大力吸收外来文化营养时，没有成为它们的奴仆，或者借用巴金的话说：“没有走上邪路”。

①② 《为〈新文学大系〉作序》，《病中集》第77—78页。

(二)

从青年时代起，巴金捕捉和探求的重心逐渐移向西方文学。他先后阅读了几乎所有西方文学的名著，并受到它们浓重而深刻的熏染。对此，巴金曾有过明确的表述：“在中国作家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①那么，巴金在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上，或者说他在对外来文化的吸取上，具有怎样的特色？他从中吸取了哪些营养呢？

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方面，巴金的突出特点是：广取博采，不拘一家。就思想性格而言，我们不妨套用一句现代常用的术语，——巴金是属于那种“开放型”、“开拓型”的人。他敢于冲破文学创作的陈旧观念，勇于开创艺术发展的崭新局面。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他既注重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获取营养，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世界，努力从外来文化中寻取借鉴。在吸取外来文化时，他充满自信，不怕“中毒”，不怕被“牵着鼻子走”。“我一字一句地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可是我还是我，并没有变成赫尔岑。同样我从四十年代起就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译来译去，到一九七四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变成了屠格涅夫呢？没有，没有！”^②正是这种自信力，使他在涉猎外国文学时，做到了气魄大，眼界宽，大胆接触，取我所需。巴金触及的外国文学的范围十分广泛，单就他所熟悉和喜爱的作家来看，就有俄国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迦尔洵、东尔尼雪夫斯基、阿

① 黎海宁译：《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香港《大公报》1979年7月1日、2日。

② 巴金：《再谈探索》，《探索与回忆》第18页。

尔志跋绥夫、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爱罗先珂，法国的左拉、卢梭、罗曼·罗兰、雨果，英国的狄更斯、王尔德、史蒂文森，德国的斯托姆，匈牙利的巴基，日本的夏目漱石、有岛武郎……。在这些外国作家中，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等各种流派都有。巴金自称“不属于任何派别”，因而在吸取外来文化时“不受限制”。他戏称自己吸取的文学营养为“杂货”。唯其“杂”，博采各家之长，所以使他的艺术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特色。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是无目的、无选择的吸取外来营养的。面对浩瀚的外来文化，巴金是运用自己的审美眼光来决定取舍的。只是这个取舍并不严格地以“派”来区分，而是依据他的独特的标准来决定的。

巴金吸取外来营养的独特标准是：强调以思想价值定取舍。一般说，每个作家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都是“各取所需”的；而对巴金来说，他的“需”往往是服从和服务于他的政治目的。巴金这一独特的取舍标准是与他独特的文学道路紧密相关的。在走上文坛之前，巴金是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在十五岁时，他读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从而找到了自己的“终身的事业”，——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而献身。为了实现其社会理想，巴金渴望从外国寻取思想武器。在二十年代乃至三十年代初，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法、俄等国的社会运动和有关著作。他以极大的兴趣先后阅读了斯捷普尼雅克、妃格念尔、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传记，认真地研究了民粹派运动的史料，并陆续编写了《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俄罗斯十女杰》、《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俄

国社会运动史话》（第一卷）等著作和文章。同其主观愿望相反，巴金的这些探究对于他所从事的事业并无多大裨益，而对他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却是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不仅从中获取了创作素材（他的某些作品是运用了这些史料的），而且也由此重视和突出艺术的社会功用。正是这种独特的审美需求，使他更加强调作品的思想价值，并更多地从思想倾向上去衡量作品的优劣。

依据这一标准，他不但着重从作品的思想价值方面定取舍，而且又往往以自己的思想口胃评优劣。从这一标准出发，他对于那些艺术价值虽不高，但却富有鼓动性和煽动性的作品，视如珍宝，表示格外的喜爱。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传记，尽管没有多大美学价值，而巴金却深为赞赏。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不合乎他的思想观点的作家，即使他们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大师（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他也表示异常的冷淡。从这种抑扬对比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

与强调思想价值相关联，巴金高度重视思想营养的吸取。巴金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时，始终重视对其思想营养的摄取。确切说，比起艺术营养方面的吸取来，他对思想养料的摄取表现得更自觉、更明确。这一点在他踏上文坛之前体现得更充分。外来文化对巴金思想的熏陶，或者说巴金对思想养料的吮吸，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如《家》中的觉慧自觉地从屠格涅夫《前夜》中寻求精神力量；在觉慧和《灭亡》中李冷兄妹身上，常常流露出托尔斯泰的“赎罪”思想；他的短篇《在门槛上》明显地受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的思想影响……。当然，对他熏陶和影响最大的还

是俄国民粹派的思想性格。在他的《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早期作品中的革命者身上，明显地带有俄国民粹派的思想气质，特别是他们那种“献身”精神，与民粹派的自我牺牲精神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巴金在谈到《灭亡》时曾指出：“在《灭亡》里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①《海的梦》中的里娜身上，也留有浓重的《地下的俄罗斯》中主人公的影子。《新生》中的李冷更是明确地表示要做一个象民意党人奈其亚叶夫那样的人。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了俄国文学对巴金思想的强有力的影响。

西欧文学对巴金思想的熏陶和感染虽然不像俄国文学那样明显，但也决非没有表露。巴金在1947年5月24日写给明兴礼的信中谈道：“我喜欢罗曼·罗兰的早期的作品，比方他所著的《约翰·克利斯多夫》，三部传记，大革命戏剧。他的英雄主义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当我苦闷的时候，在他的书中我常常可以寻到快慰和鼓舞。他使我更好地明瞭贝多芬的‘由痛苦中得到快乐’。靠了他，我发现一些高贵的心灵，在痛苦的当儿可以找到甜美，可以宰制住我的痛苦。他可做我们的模范和典型。‘爱真，爱美，爱生命’，这是他教给我的。”在1979年巴金重访法国时，再一次表示了他“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②与其他作家相比较，巴金의思想和创作所受的外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是较为突出的。

我们说巴金重视思想营养的摄取，这并不是说他忽略或

① 巴金：《谈〈灭亡〉》，《巴金文集》第14卷，第317页。

② 巴金：《再访巴黎》，《随想录》第1集，第72页。